

周族史詩研究

张松如 郭 杰 = 著

ZHOU • ZU • SHI • SHI • YAN • JIU

长 春 出 版 社

周族史诗研究

张松如 郭 杰 / 著

长春出版社

(吉)新登字 10 号

书 名	周族史诗研究
作 者	张松如 郭 杰 著
责任编辑	张中良
封面设计	王国擎
督 印	郝 莉
出 版	长春出版社(长春市建设街 43 号)
发 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吉林农业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7.75
插 页	1
字 数	161 000
印 数	1—2 000 册
版 次	199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04—690—9/I·144
定 价	14.00 元

(如遇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张松如(笔名公木) 1910年生,河北束鹿(今辛集)人。20年代曾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历任八路军直属政治部文艺室主任,东北大学教育长,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所长,吉林大学副校长,吉林省作家协会主席,吉林省文联副主席等职。现任吉林大学文学院名誉院长、教授,中国诗经学会顾问。除创作大量诗歌作品外,主要学术著作有《老子说解》、《中国诗歌史论》、《诗论》、《第三自然界概说》、《商颂研究》等书,并主编《中国诗歌史论丛书》、《中国诗歌美学史》等书。

郭 杰 1960年生,江苏徐州人。曾就读于徐州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曾任教于中国矿业大学、上海政治学院。1990年于东北师大获文学博士学位。1995-1996年为美国康奈尔大学比较文学系访问学者。现任吉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诗经学会理事。著有《屈原新论》、《元好问》、《先秦诗歌史论》(合著)、《搜神记选》(合著)等书,曾任《中国诗歌史论丛书》副主编、《中国文化大百科全书·综合卷》副主编。发表学术论文六十余篇。

目 录

1	引 言
	周族的兴起
12	第一篇
	神奇的诞生之歌
	——《生民》译释与说解
33	第二篇
	爽朗的迁徙之歌
	——《公刘》译释与说解
50	第三篇
	欢畅的安居之歌
	——《绵》译释与说解

73	第四篇
	雄壮的扩张之歌
	——《皇矣》译释与说解
108	第五篇
	威武的征伐之歌
	——《大明》译释与说解
131	结 语
	史诗的探索
147	附录一 《七月》译释
169	附录二 《七月》作年考
202	附录三 《文王》译释
217	附录四 《文王有声》译释
233	参考书目
240	后 记

引言 周族的兴起

在我国古代，各族的社会发展是很不平衡的。当夏族和商族已经进入阶级社会的时候，周族还过着没有阶级的原始氏族公社制的生活。及至他刚刚叩开文明时代的大门，便成为一种比较强盛的力量，对趋于衰落的殷商进行暴力的征服。这对于实行着东方型奴隶制的殷商说来，则意味着完成了“最后被一个用另外一种生产形式代替了奴隶制的民族征服”^①。

根据文献记载，周族的发祥地和早期活动的地方都在泾渭二水流域，如弃封于郃，公刘迁于豳，古公亶父避狄迁于岐，文王作沔，武王都镐，都在这一带。这些早周史迹，在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大都是有所反映的。

那么，早周的历史发展是怎样的呢？

周族和羌族的一个姜姓部落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结成了世代通婚的部落联盟，长期和睦地相处^②。这就是说，以熊为图腾的周先祖同以羊为图腾的羌，自古便实行着氏族外婚制，周族的始祖出于姜姓，这传说就是这样来的^③。最原始的姬姜两族可能是一个胞族，他们互为婚姻。从氏族来说，是族外婚；从胞族来说，是族内婚。姬姜两族，世代婚姻，一直延续到春秋时代。

相传周族的始祖名弃，弃的母亲名叫姜嫄。《诗·大雅·生民》说：“厥初生民，时维姜嫄。”弃是姜嫄在旷野里“践巨人迹”怀孕而生的，“知其母，不知其父”，那时大概仍处在母系氏族社会的阶段。周弃的诞生，据史籍记载，有的说“在陶唐虞夏之际”，与尧舜同时（《史记·周本纪》），有的说“曾服事虞夏”（《国语·周语》），有的说约当夏末商初（《礼记·祭法》）。传说虚渺，恍惚难定^④。而《左传》昭九年云：“我自夏以后稷。”昭二十九年云：“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看来后稷乃古“农神”，亦以为官名，自虞夏以来周祖世为后稷之官。又《周语》及《周本纪》都以为自后稷十五传而至文王。当然，这世系越在古代，恐越多遗漏。大概从弃开始，周族才由以原始农业为基础的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则是比较可信的。

周弃是善于种稷和麦的人，因此被尊为农神，号称后稷，姓姬氏。这表明周族在很早以前就是一个从事农业生产部落，而“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后稷活动在有邰（今陕西武功县）一带。据

《史记·周本纪》记载，中经不窟、鞠，三传而至公刘。且云：“不窟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窟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于此《正义》据《括地记》指出：“不窟故城在庆州弘经县南三里。”按：唐庆州即汉北地郡，清甘肃庆阳府。不窟冢在府城东三里，城内有不窟庙。是不窟窳居在庆阳也。至于三传世次则荒渺难凭。如《史记·刘敬传》就曾说：“周之先，自后稷，尧封之于邠，积德累善十有余世，公刘避桀居豳。”若此，不是三传而是十有余传了。盖“从后稷以后到公刘以前，根本无世次可言，原始社会的酋长是选举的，不是世袭，在这里如何会有世次呢”（孙作云《从诗经中所见的灭商以前的周社会》，见《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第104页）。这判断是有道理的，一扫古人于此纷繁不实的传说。若论早周世次，或可起自公刘。既云“避桀”，其时似与商汤相仿佛，或略早。公刘迁徙到豳地（今陕西长武、邠县、柘邑一带）定居，事见于经传。据《诗·大雅·公刘》记载，他在迁徙时，周族人都装满了干粮，携带着武器；到了豳地，他便观察地形，择地而居；又寻找水源，组织生产；“彻田为粮”，改良“执豕于牢”，家畜饲养业也很发达；社会生产开始有了剩余，部落逐渐兴旺起来，私有财产已露苗头，从而各家族间的财产不平等日益增加，具体有了向父家长制家庭公社亦即家庭奴役制逐步发展的条件。《史记·周本纪》说：“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渡涧，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正是说的这种情景。

从公刘以后，中经庆节、皇仆、差弗、毁隳、公非、高

圉、亚圉、公叔祖类，九传而至古公亶父。约五百年间，有世次而无史实，在史书上形成了一个“缺环”。或曰：“皇仆”之“仆”，“高圉”、“亚圉”之“圉”，皆奴隶名，周人上世曾为他族奴隶而从事畜牧之业乎？《鲁语》：“高圉、太王，能率稷者也，周人报焉。”《左传》昭七年周王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亚圉？”岂高圉、亚圉在传说中为周人“中兴之主”，与抒之在夏、上甲微之在商相同，亦与太王有相类之处乎？凡此均乏实证，于文献无可稽考。或谓《诗·豳风·七月》乃周先公居豳时留传下来的民歌，至少其中有的片段是“笃公刘于豳斯馆”后的作品，此诗写定容在宗周建国之后，而作为兴句的“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仍然残留着氏族公社生活的吉光片羽，所谓“授衣”，当是残留农民头脑中的一种记忆或想象。而就其全诗来看，则又显示出父家长制家庭奴役制的色彩情调。我们或者可以从这里窥测到一点周人居豳时期的社会状态。及至古公亶父率领周族由豳迁岐（今陕西岐山县）^⑤，周族历史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后汉书·西羌传》说：“及武乙暴虐，犬戎寇边，周古公鞮梁山而避于岐下。”这是说古公亶父迁岐，约在商王武乙之世。据《诗·大雅·绵》记述，初到岐下时，生活很不安定，于是就跟他的配偶姜女，前来视察住处：“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在岐山之南，发现了一片名叫“周”的平原沃野，这就是周原，从而“筑室于兹”，定居在那里，周族的得名，当始于此。他发动周人改革戎狄旧俗，开草莱，立家室，筑城郭，设官吏，并利用战俘（“戎丑有行”）作奴隶和农奴，从事开辟生产（“周爰执事”）。一夫

一妻制的确立，家族奴役制的发展，原始氏族制社会的走向崩溃，从而开始了氏族部落酋长职能向王权的蜕变，以致文明时代的大门被启开了。

为了借助商的力量对付鬼方，古公亶父乃朝服于商，表面上做商的附属国^⑥，实际上已有了灭商的意图。《诗·鲁颂·閟宫》：“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史记·周本纪》：“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至少，可以理解为已经打下了灭商的基础。其子季历还和商通婚，吸收商的文化，这时周族社会有很大发展。季历向戎狄部落大举用兵，“伐西落鬼戎，俘十二翟（狄）王”（今山西潞城县一带），“伐燕京之戎”（今山西汾阳一带），“伐余无之戎，克之”（今山西治县一带），“伐始呼之戎”，“伐翳徒之戎”^⑦。除伐燕京之戎一役“周师大败”而外，其余都取得了胜利。周族的势力因此得到巩固与扩大，并且发展到晋南。季历为什么一味地征服晋南的戎狄呢？应该说，这是为了东进，与后来的“西伯戡黎”走着同一条道路。这首先迫使商王朝不得不采取怀柔政策，所以于文丁四年：“周人伐余无之戎，克之。周王季，命为殷牧师。”^⑧而周族的发展引起了他们和商族的矛盾，以至约于文丁十一年，“文丁杀季历”^⑨。在周王季历在位期间，由于战争中的虏获，周族统治者迅速增加了自己的财富以及奴隶和农奴。据《诗·大雅·皇矣》说：“帝作邦作对，自大伯王季”，“王此大邦，克顺克比。”在王季的统治下，周族虽仍保持着他们的氏族组织，但已经踏上阶级社会的门坎，一个包含着萌芽状态的奴隶制和农奴制的部落国家——周，在我国陕甘一带建立起来了。

这个国家进一步强大起来，是在“文王受命”之后。商王文丁杀死季历，季历子昌继位，是为文王。文王时，周族已成了西方的伯主，虽然商纣王仍称之为“西伯”，实际上周已摆脱了附属地位而独立发展。他开始了对四周诸族的战争，先后征伐昆夷（鬼方）、密须（今甘肃灵台）等族；虞（今山西平陆）芮（今陕大荔、山西芮县一带）两族也来归服；然后更渡河东征，攻克黎（今山西黎城）、邶（今河南沁阳）；最后伐崇侯虎，灭掉了崇（今陕西沔水一带）而作丰邑（今陕西户县），自周原迁都于此；同时又使其子发——武王，在沔水东岸营建镐京。从此丰镐便成为周的统治中心。这些都在前引《绵》及《皇矣》诸诗中有所反映。文王是个很有作为的国君，于其在位七年间，不只完成了“西伯戡黎”的事业，而且还扬威南国。史籍中虽然没有文王经营南国的明文记载，而周的国势已经慑服了南国。这所谓南国，从周国本土来讲，就是指陕西南部、四川中北部，更重要的指周国的东南方，即今河南西南部、湖北一带。当纣王全力用兵东南、无暇西顾的时候，文王却趁机发展政治、军事力量，以至“三分天下有其二”，对商都朝歌完成进逼形势，灭商的条件都具备了。

在武王翦商以前，周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结、以父家长制家庭公社为基础的包含着萌芽状态的奴隶制和农奴制的部落国家，一切礼法典章，到文王时已经齐全，所以说周人所通行的制度，皆肇自文王。《诗·大雅·文王》：“仪刑文王，万邦作孚。”《诗·周颂·清庙》：“济济多士，秉文之德。”这里由于周族建国的根基，乃是古公亶父、季历以迄文王才开拓树立起来的。《尚书·无逸》：“太王、王

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意思是说，自从太王、王季能够敬天自励，文王更遵从先王的作风，继续致力于管理农事。《楚辞·天问》：“伯昌号衰，秉鞭作牧。何令彻彼岐社，命有殷之国？”意思是说，西伯姬昌振微起衰，掌握权柄号令诸侯。为什么天命他拆掉岐社，取代殷王统治全国？这一切都在指明为《尚书·康诰》所说的“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亦即所谓“文王受命”。实际上是经过古公亶父、季历，特别到了文王姬昌在位时，对周围众多部族进行征服兼并，已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的政治实体。马克思说：“假如与土地一起，也征服了作为土地有机从属物的人本身，那么，他们也就征服了作为生产条件之一的人，这样便产生了奴隶制和农奴制，奴隶制和农奴制迅速改变一切集体的原始形态，本身就变成它们的基础。”（《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这也就是日后发展起来的实行分封和世禄的封建领主庄园土地制度的基础。同时这也就是通过民族征服来代替殷商奴隶制的另外一种生产形式。

但是文王还没有完成这种民族征服，还没有完成他的灭商事业，便得病逝世。子发继立，是为武王。武王为完成父业，在毕地祭了天，奉文王木主，出兵东征。《诗·大雅·荡》诗八章，七章首二句云：“文王曰咨！咨汝殷商。”说者谓此诗为武王假遵文王，载文王木主伐纣，声讨纣罪之檄文，与《泰誓》、《牧誓》同类，惟用韵而已。盖其然欤？但武王本察情势，似乎商的实力还不可轻视，深恐一击不中，反而损了自己的威信，所以即命班师。又过了两年，大约在公元前1027年^⑩，也就是武王嗣位的第四年，他

觉得时机到了，就率领着“兵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史记·周本纪》），自丰镐出发，并联合反商的部族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的武力，浩浩荡荡直奔商郊。其中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姜太公，根据有关的传说，我们可以合理地判定他是一位游牧于渭水上游羌族的部落长，在伐商的战争中曾担任总指挥，建立了特殊功勋。周族和羌族自古就保持着密切关系，结成为部落联盟；而殷商统治者则自武丁以来一直对羌进行侵略，把俘掠来的羌人变成奴隶，并大量用做牺牲。其他许多部族也都同样遭受着殷商奴隶主的暴虐压迫。所以在伐商战争中，各部族之间便很容易形成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的气势。他们从汜水边上（今成皋）渡过黄河，一气走到商都郊外的牧野（在朝歌南七十里，今河南省淇县南）。第二天一早，武王召集了所有的军队誓师。那时商的军队重重迭迭，数目相当多。《诗·大雅·大明》记载当时的阵势说：

殷商之旅，其会如林。
矢于牧野，维予侯兴。
上帝临女，无贰尔心！
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駉骖彭彭。
维师尚父，时维鹰扬。
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

这就是说商纣王的军队虽多，而大多数是从东南夷俘虜来的，怀着二心；周武王的军队，在姜太公英勇指挥下，直冲过去，纣的十几万大军一齐溃退；伐商以除秽浊，不

崇朝而天下清明。后人形容这次大战，说杀伤之多，“血流漂杵”。纣王看大势已去，便奔到鹿台上，放火自焚而死。就这样，我国历史上的商朝顷刻灭亡了，武王领导的这场战争完全胜利了，实行封建、建立宗法的周王朝正式走上了历史舞台。

《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诗篇，都列在《诗经》的《大雅》中，盖为宗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辞，出于贵族之手。不过其中记述了周族的兴起和灭商的经过，包含着丰富的早周史料，甚至夹杂着相当的神话传说，有的很可能是史官或乐工改作过的周族传诵下来的祖先颂歌，我们完全可以把它们看做周族史诗。兹将前述诸篇依序绎释，并加说解，以待验证。书中引文，为节省篇幅计，或简称书名，或未注版本，但这一切都在书后所附“参考书目”中做了详细的补充和说明。

注

- ①恩格斯《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76页。全文作：“奴隶制，在它是主要形式的地方，使劳动成为奴隶的活动，即使自由民丧失体面的事情。这样就封锁了这种生产方式的出路，而另一方面，更加发展的生产受到奴隶制的限制，迫切要求消灭奴隶制。一切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生产和以这种生产为基础的公社，都是由于这种矛盾而毁灭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矛盾是通过另外的比较强盛的公社对衰落的公社进行暴力的奴役而解决的，只要这些比较强盛的公社本身也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那这里发生的就仅仅是中心的转移和这一过程在较高阶段上的重复，直到最后被

一个用另外一种生产形式代替了奴隶制的民族征服为止。”

- ②章炳麟《检论》卷一《序种姓》云：“羌者，姜也。晋世吐谷浑有先零，极乎白兰。其子吐延为羌酋姜聪所刺，以是知羌亦姜姓。”按：甲骨文姜、羌一字，此说已成定论。
- ③参阅孙作云《周先祖以熊为图腾考》，见《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第1—21页。
- ④《史记·周本纪》：“弃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谷。封弃于郤，虽曰后稷，别姓姬氏。’”这是与尧舜同时说。《国语·周语》：“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这是曾服事虞夏说。《礼记·祭法》：“夏之衰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左传》昭九年说：“我自夏以后稷。”昭二十九年又说：“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这是夏末商初说。
- ⑤参阅陈全方《早周都城岐邑初探》，见《文物》杂志1979年第10期。
- ⑥参阅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周初甲骨文》，见《文物杂志》1979年第10期。又杨升南《卜辞中所见诸侯对商王室的臣属关系》一文中之第五节《解剖一个实例——商与周的关系剖析》，见《甲骨文与殷商史》第156—166页。
- ⑦⑧俱见《后汉书·西羌传》注引《竹书纪年》。
- ⑨《晋书·束皙传》注引《竹书纪年》。
- ⑩文王“受命”七祀崩。文王八祀武王即位，未改元；九祀武王嗣位二年，东观兵于孟津；十一祀武王克商，即武王嗣位之四年。日人新城新藏作《周初之年代》，推算克商为公元前1066年；董作宾《四分一月说辩证》及《殷历谱》定为公元前1111年；唐兰《中国古代史上的年代问题》考定为公元前1075年；近人雷宗海、陈梦家、丁山等又依据《竹书纪年》考定为公元前1027年。今人多从此说，说见陈梦家《西周年代考》。按：

《竹书纪年》云：“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幽王十一年被杀，在公元前 771 年，逆推二百五十七年，正是公元前 1027 年。